

试论中国民间文学话语的依附及其迷失(1945~1959)

刘 波

内容提要： 1945~1959 年的中国民间文学，延续的是延安范式，贯彻“一切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理念，处于对苏联的知识依附和对政治意识形态依附的阶段，民间文学的研究缺乏话语的自主性及学术高度，其学理性被消解，从“文艺的”和“学术的”两套范式里脱轨，处于迷茫之中。

关 键 词： 民间文学 依附话语 研究范式

1945~1959 年是历经国共之争、新中国成立到巩固人民政权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以延安文学为标准，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胜利而不断扩大影响，到 1949 年 7 月南北文艺工作者在北平（今北京）大会师，最终确立了延安文学的主导地位。20 世纪上半叶那些曾风光一时的民间文学中坚分子，此时有了不同的出路和命运。延安的范式是对苏联文艺的模仿和“一切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理念，也即一切文艺为政治服务。民间文学本身缺乏自主性，处于对苏联的知识依附和对政治的意识形态依附的境地。民间文学在“新民主主义文学”的建设号召下，以“人民性”为显性话语，酝酿着新的文学格局。

—

20 世纪 40 年代，由于抗日战争和三年内战的特定历史背景，中国的政治时局和文化格局，可化分为国统区、沦陷区和解放区。国统区的民间文学研究呈现出高度学术化的特征，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从民间文学中找到资料的佐证和阐释的空间。民间文学不再像“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样主要从文学的角度进行阐释，而成了多学科共同研究的对象，在跨学科的研究中，民间文学的学术品格得到了较大的提高。沦陷区则延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的研究路径，只是更多地从“俗文学”的角度关照民间文学，把民间文学视为俗文学的组成部分，有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合流的倾向。但这样的研究跨于书面范式（通俗文学）与口头范式（民间文学）两翼，在研究中又主要着手于书面范式，民间文学没有得到更大的发

展。解放区则接续的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概念,而不是二三十年代从新文学中发展出来颇具学科意味的“民间文学”。解放区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精神指导下,建构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学”。毛泽东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①《讲话》中又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以“工农兵”为主体;文艺以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为理论。在《讲话》中没有明确提“民间文学”这个词。但是从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劳动阶级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的境遇就是中国的境遇,唯有解放农民才能解放中国^②;到左翼作家联盟要求作家和文艺青年关心社会现实,接近劳苦大众,到民间去;到毛泽东说“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③,可见“新民主主义文学”是为工农兵尤其是为农民的文学。在这样的“新文学”观下,解放区一方面进行“新民主主义文学”的建设,一方面热烈地开展“民间文学运动”,以便“利用这种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去进行宣传教育”^④,将民间文学作为宣传、教育、团结群众的工具。

解放区的民间文学话语十分强调主体的阶级性、功能的政治性,与此前的民间文学研究,以及国统区尊重民间文学原始形态的学术精神大相径庭。

但这一新的话语理念恰恰通过政治优势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正统意识形态逐渐成为权威话语。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国共之争中的胜利,一批批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进入北京及全国各大城市。他们大都成为各个行业和部门的中坚、执牛耳者。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今北京)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在这场号称新中国成立前夕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中,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周扬代表解放区发言,指出在今后的文艺工作中必须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工农兵服务这样一个延安传统。宣布新文艺的方向,就是《讲话》所规定的“人民的”方向。在解放区的优势引导之下,民间文学话语无疑是延安“民间文学运动”的扩大。

延安的民间文学立论的基础是“阶级性”和“人民性”,而此时新中国成立,人民大众已经当家做了主人,阶级存在的基础已不复成立,那么,“民间文学”从逻辑上来说就是“人民文学”了。于是产生了蒋祖怡的《中国人民文学史》(1950年4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赵景深的《民间文艺概论》(1950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等著作。蒋祖怡认为“人民文学”是劳动大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8页。

② 《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46~147页。

③ 《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59~260页。

④ 陕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关于民间文学》,内部参考资料,1954年,第103页。

众的口语的文学,是文学史的正宗;赵景深也把民间文学的宗旨归纳为“为工农兵服务”,而且为了扩大宣传和教育工农兵,可以改造民间文学。这些说法显然是向《讲话》精神靠拢。由于一度将“民间文学”等同于“人民文学”,于是传统的作家文学地位堪忧。这引发了一次关于“人民文学”范畴的大讨论。经过长久的讨论,其结果是“民间文学”无法涵盖整个中国文学,也无法占据中国文学的“正统”地位。这就是说民间文学不是“人民全体”的文学,只是以工农兵为主的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而劳动人民当时主要是指从事体力劳动者。所以这一时期的“民间”就是“劳动人民”,特别指体力劳动者生活的空间以及知识系统,这无疑承继了延安时期的“民间”理念。“民间文学”回到了固有的“文学的组成部分”的地位。

但是因为新中国的“民间文学”来自延安时期的建构,“民间文学运动”为新中国的创建立下了功勋,所以“民间文学”虽然并不能在官方宣告中等于“人民文学”,却也拥有崇高的地位。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这是“第一次文代会”后成立的第一个协会。冯雪峰都不禁问:“已经有了中国文联,周扬同志又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不是成立了第二文联了吗?”^①虽然冯雪峰的意思是不必另立民间文艺研究会,但已可从中看到民间文学在当时非同一般的地位。

不过,从民间文学的学理本身来说,50年代的民间文学研究实际上还处于低级阶段,甚至大不如前。其话语体系是苏联民间文学论和马克思主义话语下的依附话语,既缺乏话语的自主性,也缺乏学术的高度,几乎一笔勾销了民间文学发展期中最为黄金时期的学术贡献。

从现在掌握的史料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苏联文学的翻译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据统计,“仅从1949年10月到1958年12月,我国翻译出版的苏联(包括俄国)文学艺术作品3526种,占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艺术作品总数的65.8%之多;总印数8200.5万册,占整个外国文学译本总印数74.4%之多”^②,可见苏联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流通之广,可以说占据了外国文学在中国影响的第一位。不仅是一般读者受苏联文学影响,学术界的基本理论和价值观也完全以苏联的文艺政策和文艺理论为导向,“当时苏联的任何文艺理论的小册子都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得到广泛传播。”^③

在中国的民间文学界,所有的学人都相信:“马克思、恩格斯虽不是专门的民间文艺或民族学研究者,但他们在民间文学领域中的学识的渊博和见解的卓越与正确,实为任何专门从事研究的学者所歆羡”,因此只要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批判了民间文学的材

① 《贾芝日记·1949年12月22日》,转引自毛巧晖《涵化与归化——论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民间文学”》,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44页。

② 卞之琳:《十年来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

③ 重庆炳、许明、顾祖钊:《新中国文学理论50年》,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页。

料,使一堆杂乱无序的材料为阐述自己的论点服务,为政治斗争服务”,那么“他们的论述”就“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基础”^①。怀着对苏联民间文艺的巨大憧憬和崇敬之情,苏联民间文学理论被陆续翻译到中国。但是由于当时所能见到的资料非常有限,所以翻译引进的著作多是苏联民间文学的入门读物。

苏联文艺理论著作中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中国文学界起了强大的规训作用。而从学术外部来说,苏联共产党对待文学遗产的态度,以及苏联共产党强调文学中的党性原则、人民性原则,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中国文艺界起着重要的思想更新和话语更新的作用。

而苏联文学之所以能在中国的文学话语上起到绝对导向的作用,并非由于苏联文学本身特别优越,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当属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因为“翻译作品并不是次要的和派生的,而是文学的主要工具之一,是更大的社会机构——如教育系统、艺术团体、出版公司乃至各级政府——用来按照自己的意愿‘操纵’特定社会,以‘建构’某种预期的文化。”^②翻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改写。当时中国的政治需要苏联,犹如巴西著名社会学家费南多·亨利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指出的,当时两国都认为“重要的是‘运动’,是阶级斗争,是对利益的再界定,是政治联盟。它们使结构得以保持,同时又使其产生转变的可能性。”^③虽然“特定的政治文化会对翻译过程发生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这种制约所表现出来的强度会有很大的不同”^④。不过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个历史时期,显然要加强权力控制的力度。因而,中国在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和政治背景之下,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凸显出来,在对苏联文学的译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民间文学界所能接受的规训自然主要是苏联的民间文艺理论。表现在学术队伍培养方面,自1953年开始不断有各地高校的师生到钟敬文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进修。但是,这些教师“来北师大前多半没有系统地学过民间文学,所以首先要求他们扎扎实实地掌握民间文学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教研室一向强调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间文学的论述,从中学习他们对待民间文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⑤而当时作为专业学习重要参考书的《苏联口头文学概论》,其实只是“苏联中学八年级用的俄罗斯文学教科书中

① 刘锡诚:《马克思、恩格斯与民间文学》,《草原》1963年第2期。

② Maria Tymoczko, Edwin Gentzler. *Translation and Power*,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7, P.25.

③ 周长城:《新依附理论:卡多佐对传统依附理论的挑战》,《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4期。

④ 王东风:《论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介入》,《中国翻译》1998年第5期。

⑤ 许珏:《北师大民间文学教研室的昨天与今天》,董晓萍编《钟敬文教育及文化文存》,北京:南海出版公司,1991年,第214页。

‘口头文学概论’部分的翻译”^①。这些短暂学习的学员,带着粗略学到的苏联民间文艺理论,很快分赴全国各地高等院校,成了民间文学的播种者。

正如刘锡诚所指出的“新中国刚刚成立,百业待兴,整个文艺工作也在创建时期,因而不具备提出以新观点和新方法建立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时机和条件。”^②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除了学习苏联外,便多从社会政治或社会学的层面谈论民间文学的价值和作用。如钟敬文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是:《请多多地注意民间文艺》^③、《民间文艺片断》^④、《关于民间文艺的一些基本认识》^⑤等。“从延安来的文艺干部,多数原本都是轻视民间文艺的,受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感染和教育,转而开始重视民间文艺了。但他们大致上是把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等同对待,用思想上的进步与落后、是否能为政治服务、艺术上是否典型、情节结构是否合理、语言是否提炼等等,来作为衡量民间文学的标准,没有看到更不可能强调民间文学的特殊性。从国统区来的学者教授们,则比较熟悉西方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他们把民间文艺当作民俗学的分支之一,通常是从社会、思维、宗教、民俗等角度来看待民间文艺,却常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学术来对待。同样都重视搜集和阐述民间文艺,但这两种不同的学术立场观点,却显出很大的差距。”^⑥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经过大讨论澄清了“民间文学”并不能等同于“人民文学”,“民间文学”却一样拥有了比此前任何时期都为尊荣的地位和光明的前程。但在学理层面却还停留在学习苏联初级民间文学理论的阶段。20 世纪下半叶民间文学的一系列理论和范式都从苏联借用而来。如术语“folklore”在西欧诸国大都用作“民俗学”,苏联的学者却用这个词来对应“民间文学”或“口头文学”。苏联著名民间文学家梭柯洛夫在《俄罗斯民间文学》中说:“应当把民间文学理解为广大劳动群众的口头文学创作。”并指出“假如‘文学’不是在字面(文字、书面)的意义上使用,而是广泛地理解为语言艺术,那么,民间文学则是文学的一个特殊部分,而民间文艺学就是文艺学的一部分。”^⑦这里的两个术语——“民间文学”和“民间文艺学”后来在中国被广泛采用。在 1950 年以前,指称差不多同一研究对象的名称,有过“白话

① [苏]克拉耶夫斯基:《苏联口头文学概论》“内容说明”,连树声译,上海:东方书店,1954 年。

② 刘锡诚:《新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1949-1966》,《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1 期。

③ 钟敬文:《请多多地注意民间文艺》,《文艺报》1949 年 7 月 28 日。

④ 钟敬文:《民间文艺片断》,《光明日报》1950 年 3 月 1 日。

⑤ 钟敬文:《关于民间文艺的一些基本认识》,《新建设》1950 年第 1 期。

⑥ 刘锡诚:《新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1949-1966》,《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1 期。

⑦ 参见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41-442 页。

文学”(代表人物有胡适、凌独见等)、“平民文学”(胡适、周作人、徐嘉瑞、曹聚仁等)、“民间文学”(胡愈之、徐蔚南、杨荫深、徐嘉瑞等)、“俗文学”(郑振铎、赵景深等)、“民众文艺”(陈光尧等)、“民间文艺”(王显恩等)。自二三十年代开始,民间文学的研究范畴就越来越清晰,由于“民间文学”的研究框架与西方的民俗学框架相近,使之更具有学科的意味,倾向于使用“民间文学”的学人也更多,但还没有达到整齐划一的程度。到1950年以后,由于受到苏联民间文学模式的影响,“民间文学”和“民间文艺学”名称的使用几乎是统一的,差别只在于在什么时机和场合使用这两个名称而已。此外,将民间文学定义为劳动群众的口头文学创作,也长期成为中国学界对民间文学的通行定义。而钟敬文提出“民间文学是特殊文艺学”^①当也受启发于此。20世纪上半叶那些曾经轰动一时,并奠定了民间文学基本方法论范式的话语体系,如人类学、民俗学,却因属于资产阶级的文化而被排斥。与大众文学最为接近的“俗文学”也因属于城市小资产阶级而被批判。人类学、民俗学、俗文学成了隐性话语,而注重政治性和思想性的“民间文学”一直是显性话语。这种状况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改观。

民间文学自其诞生以来,就有两个研究范式,一是“文艺的”,一是“学术的”^②。50年代的民间文学显然接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文学”为本位的话语立场,在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五四”时期的民间文学具有意识形态更新的意义,要打破帝王将相的上层话语权,解构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主义、独裁主义及其权力体系下的知识话语体系,捧老百姓的言论和文学样式上尊位,目的是实现人的解放,使得人人能享有平等自由的人权。4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的民间文学,接着倡导文艺的启蒙精神,但话语内核置换成了“为工农兵服务”,带着鲜明“阶级论”的特点,似乎也在进行意识形态的更新,而更新的内涵却充满了政治的气息。“五四”时期的民间文学是话语诞生的基础和起点,而这个时期的依附话语却勾销了既有的学术框架和作为学术研究应有的科学性及价值中立等立场,积极倡导着一切为政治服务。民间文学的“文学性”显然失落,民间文学从“文艺的”和“学术的”两套范式里脱轨,从而走向了迷失。

二

话语的依附虽然在中国的历史上自始有之,这与整个国家的权力系统、国家体制紧密相关。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各国都存在权力对话语的支配现象。布尔迪厄在他的社会学研究中

① 钟敬文:《加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工作》,《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5页。

② 参见刘波《“文艺的”与“学术的”:现代民间文学话语范式转换新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7期。

就曾指出,权力不是一个孤立的研究领域,而是位于所有社会生活的核心。在任何社会,都值得研究文化的社会化如何把个体与群体置于一个竞争性的等级体系中,相对自主的斗争场域如何使个体与群体陷入争夺有价值的资源的斗争,这些社会斗争如何通过符号的分类得到折射,行为者如何通过各种策略获取利益,以及他们如何在这样做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再生产着社会的分层秩序。^①这些研究和分析,会让我们看到,文化不能免于政治的内容,而是政治的一种表达。

中国思想史的事实也让我们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在绝大多数时期都缺乏话语的独立性,虽然政治与文化之间是互动的、相互制约的张力关系,但在多数情况下,文化对政治的依附更为常见。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

中国的“士”是以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为某种权力服务的阶层,他们的生存逻辑是以知识才能换取生存所需的基本条件,从而得以维持其生存。在传统社会里,他们虽然在习俗上居于“士农工商”之首,似乎有高山景行之位,其实在权势者的心目中却是“九儒十丐”。因为农人种植谷物,工人制作器具,商人从事贸易,他们的社会作用与“学成文武才,售于帝王家”的文人不同,前者不可或缺,因为关系国计民生;后者则有之无之皆可,不会对国计民生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这就决定了中国“士”阶层的生存必须依附于某种权力,更多的要看权力者的脸色行事。这种生存逻辑决定了“士”对权力有着特殊的感觉和认识,总是处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境地。

“士”阶层在历史中形成的这样的生存方式,决定了这个阶层对于政治与文化的态度,即:以对政治的依附性为前提,承担着中国文化的“创造”(“述而不作”意义上的创造,或者是“照着讲”和“接着讲”意义上的创造)与传承之责。

这种生存方式衍生出的政治依附性特质,并不是历史中某朝某代的灵光乍现,而是在制度支持下的常规性历史现象。^②

虽然知识分子对政治的依附是一种常态,但也有强弱之分。当国家的集权统治较弱时,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就大,文化就繁荣昌盛。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不仅可能掀起社会思潮,还会对社会政治发生导向作用。比如晚清和“五四”学人共同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并由此造出

① [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7页。

② 张蓬:《中国传统哲学的政治依附性与“中国哲学”的特质》,《学术研究》2009年第6期。

现代意义上的新的中国。但国家权力集中并加强统治时,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就小,依附性就很突出了。

四五十年代的中国正好处于政权更迭,巩固统治的时期,由此,知识和学术依附于政治的特性非常突出,尤其是40年代后期的延安到50年代新中国初成立这一历史时期。

50年代的中国文学话语,包括民间文学话语在内,其总体结构如荷兰汉学家佛克马所说:

既不是独立于外国影响的产物,也不是本国传统自然发展的结果。它迥异于苏联的、西方的以及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规范,它是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产物。^①

佛克马认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话语的核心是毛泽东思想。他说: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文学理论的基本原则……提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强调民间文学的价值,同时也以苏联为例,引述了苏联文学理论的三大要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党性和典型性……正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中国文学理论的主要命题。^②

根据佛克马的看法,在实践层面,新中国成立后话语权实际掌握在“文化设计者”手里。如果说毛泽东是“总设计师”和“精神导师”,那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就是“执行设计师”。对此,有论者总结并评论道:“毛泽东的文艺观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美学+现实主义哲学+功利主义思想的混合体,以社会效果区分艺术好坏,其必须避免不好的艺术,因为它不能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20世纪50年代,周扬充当着毛泽东文艺观最重要、最彻底的推手之一,而郭沫若、茅盾等人则发挥了敲边鼓的作用。周扬强调文艺的重要性在于其教育功能,但他又一再把教育狭隘化,使之成为政治形塑的代名词。身居要职的‘文化设计者’行使着文学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双重功能,文学因而被政治裹挟和束缚。”^③

①〔荷〕杜威·佛克马:《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季进、聂友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7页。

②同上,第250页。

③张晓红:《从那里出发:评佛克马〈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3期。

三

总之,从依附话语我们可以发现:民间文学是一个系统,被双重因素所操控:一个为系统内部因素——民间文学本身,包括民间文学的研究者、传播民间文学知识的教师、介绍引入外国民间文学理论的翻译者等在内的各类专业人士;另一个为系统外部因素——赞助体系。赞助体系通过各种管理机构,如学术团体、审查局、评论杂志、教育机构等,至少对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行和传播进行控制,使那些关注民间文学的“专业人士”俯首听命于赞助体系所处时代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收集整理和翻译等起着促进或阻止的作用,是一股可能有助于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止、毁灭民间文学研究的力量,它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文学的传播与兴衰、本土研究的发展方向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见,赞助体系体现的是当前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有权力),这才是操纵学术话语的最关键因素,而学术本身受制于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对民间文学系统内部产生功能。

对于 50 年代整个中国文学来说,因为受到外部因素的强制性规范,所以“中国文学理论是规定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①民间文学的下层民众属性显然迎合了当时的政治口味,而颇具有国际视野和学理内涵的民俗学、人类学、俗文学等则被作为“封资修”的产物而被排斥了。因而,此时的民间文学走向了“文艺的”范式,“学术的”范式隐没了。而这“文艺的”范式却是政治化的,正如佛克马的担忧“中国文学理论对文学素材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社会和政治功用上,这不禁使人怀疑还能不能合法地讨论真正的文学理论。”^②民间文学的学理性被消解了,因而作为一门学问来说,民间文学无疑走向了迷失。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理论建构(1949—1966)》(项目批准号:13CZW090)阶段性成果之一。

(刘波,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毛巧晖】

①〔荷〕杜威·佛克马:《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季进、聂友军译,第 246 页。

② 同上,第 247 页。